

文学

1958—1966... 东方文学学科之起步

何乃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

文学

文学

1958—1966 .. 东方文学学科之起步

何乃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

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58—1966: 东方文学学科之起步: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中心/何乃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203 - 2526 - 4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文学研究—东方国家—1958—1966
IV. ①I3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33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329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作为我国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一个新学科——“东方文学学科”，是从1958年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提起1958年，众所周知，那是新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与“大跃进”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大学里还有“教育大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到“教育大革命”运动呢？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学科”就是在这个运动里诞生的。当时，外国文学教研组党支部提出，外国文学教学的主要问题是“三有三无”，即有西（西方文学）无东（东方文学），有古（古代文学）无今（现代文学），有资（资产阶级）无无（无产阶级）。其中有资无无的提法未必妥当，但前两者确实是问题，触及要害。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确定改革的重点在于创立东方文学和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中文系党总支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便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成立几个小组开展工作，名之曰“攻坚战”。

的确，在此之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只讲西方文学（包括欧美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两部分），不讲东方文学；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不仅北京师范大学如此，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也都是如此。在“教育大革命”运动中，人们认识到这种

状况是不合适的。因为所谓外国文学，顾名思义是指中国以外的文学，当然应该包括中国以外世界各国的文学，既包括西方国家的文学，也包括东方国家的文学。更何况中国本身就处于世界的东方，属于东方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也属于东方文学的范畴；而且当时东方许多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把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在课堂上讲授呢？这是当时我们共同的想法。

于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作为“教育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东方文学小组”便应运而生，其成员包括苏联文学研究生、进修生和本科毕业班学生，共计一二十人。作为外国文学教研组成员之一的陈惇老师，被教研组指定，除了重点参加西方文学小组的工作之外，还要关注东方文学小组的工作。陈老师自己对东方文学也很有兴趣，因此时有参与。虽然这些人没有在课堂上学习过东方文学，甚至不知道东方文学应该包括哪些国家、作家和作品，只是笼统地知道东方文学是指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白手起家”，“大干快上”，“突击”（后三个词语是当时各行各业通用的口号）编写东方文学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我们按照东方各个国家分成若干小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便把东方文学的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都编写了出来。当时的“东方文学小组”包括陶德臻老师和我在内。陶老师是以东北师范大学教师的身份来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的，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班的学生。记得我参加的是蒙古文学小组，组长李自昆是一位女老师，苏联文学进修班学员，来自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年龄似乎已经不小了；一位组员也是女的，不知是苏联文学进修班还是研究班的学员，年龄也比我大，可惜我不记得她的姓名；再一个组员就是我。我们三个人除了参加必要的政治活动以外，一有时间就“突击”查找资料，阅读作品，编写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最后总算在7月完成了任务。在我的印象中，那段工作的后

期，天气酷热难耐。但是我们不顾一切地开夜车，抢进度，往往由于太缺觉了，坐在教室或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时，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过来一看，桌子上湿了一大片，原来都是自己流出来的口水。

现在的人或许很难想象，怎么可能在这样一无所有，又无先例的基础上，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编写出一套东方文学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来呢？但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当时做什么事都讲究“突击”，都讲究“大跃进”，都讲究“多快好省”，编写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也不能例外。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编写出来的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其水平自然也不可能很高。其中，东方文学教学大纲与西方文学教学大纲一起，于1958年9月在学校印刷厂铅印出版，题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并注明“中国语言文学系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等字样。东方文学讲义由于觉得不够成熟，一直没有印刷出版，只是保存下来手稿（这些手稿后来长期存在外国文学教研组，不知是否保存至今）。而东方文学参考资料则作为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辑的七卷本《外国文学参考资料》^①的一卷，即《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59年2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5000册。这本书共计55万字，分为“绪言”、“朝鲜文学”、“越南文学”、“蒙古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尼西亚文学”、“日本文学”和“土耳其文学”9个部分，收入88篇文章。该书虽然是资料性的成果，不是研究性的成果，但毕竟是我国东方文学学科领域正式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书籍，所以值得特别提及。

若问我为什么要参加“东方文学小组”的工作，其实自己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参加这个组的同学比较少（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在本科毕业班中似乎只有我一人参加，其他的成员都是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的，而他们1958年暑假后又全部离开北京师范

^① 据陈惇老师回忆，冯至先生曾经就这套书对他说：“师大办了一件好事。”

大学了，包括陶老师在内；不过，1978年陶老师又从东北师范大学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我共同担任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想去试试。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可是，不料这一下子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甚至也可以说决定了我一生的大致命运。因为，到当年7月底毕业时，我被留在学校中文系任教，并被分配在外国文学教研组工作，任务就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这显然是因为我在毕业前参加过“东方文学小组”的关系。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从事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因为这个专业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先生指导，难度很大。然而，我必须服从分配（其实不仅我一个人服从分配，那时的学生几乎都服从分配），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不很愿意干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

1958年暑假以后，外国文学教研组内成立三个教学小组：东方文学组，西方文学组，俄苏文学组。东方文学组包括陈惇老师、李启华老师和我三人。此外，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来进修一年的李锡禧老师也参加我们的讨论。陈老师的专业是西方文学，本应参加西方文学组，但教研组主任刘宁老师让他先参加东方文学组，以后再进行调整。陈老师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安排。于是，我们边干边学，相处很和谐，工作很顺利，并且卓有成效，主要是在一个基本观念上取得了突破，即确定东方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国别文学的拼凑，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整体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李启华老师是在我之后不久从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的，任务与我一样，也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只可惜她在两三年后因有其他工作，调离北京师范大学。不过，日后在正式编写东方文学讲义时，她虽然已经离开，可是她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被忽视，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吸纳进东方文学讲义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讲义乃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再者，陈惇老师在这几年中曾经热心地帮助过我，给我出过许多好主意，替我想过许多好方法，看过不少我写的讲

稿和讲义，提过不少宝贵的意见，还亲自动笔写过一部分讲稿，并在其中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后来我自己写这部分讲义时汲取了其中的精华，觉得获益良多。此外，外国文学教研组主任刘宁、谭得伶老师以及其他老师也用各种形式支持我，鼓励我，给我增添了不少勇气和力量。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在中国的大学中文系进行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包括编写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教材和参考资料，开设东方文学课程，从事东方文学研究，是从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的，随后则在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学校陆续展开。当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开创工作并不是独自完成的。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1958年暑假以前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绝大部分是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的学员，而这些学员原本是从全国各大学来的外国文学教师和准备加入外国文学教师行列的本科毕业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项开创工作乃是全国多所大学的联合行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这项开创工作又通过以下各种渠道推动和影响了全国其他许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学员在1958年暑假后分赴全国各个大学任教；新闻媒体对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的宣传报道；北京师范大学从1958年暑假后开始招收东方文学的进修教师等。

从1958年至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现在改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除了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之外，一直坚持从事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不断致力于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一直不断地提高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水平。总之，从东方文学学科的创立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它的起点；从东方文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它的重要基地之一。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1958—1966年起步阶段那些往事渐渐被人淡忘。因此，作为参与其事的成员之一，我觉得

有必要回顾那段往事，记述那段往事，并用今天的眼光审视那段往事，分析它取得的成绩是什么，它存在的缺点是什么，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对北京师范大学东方文学学科建设起步阶段工作的小结，同时也是对我国大学东方文学学科建设起步阶段工作小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关于《东方文学教学大纲》	(1)
------------------------	-----

第一节 教学大纲的“说明”	(1)
---------------------	-----

第二节 东方文学的“绪言”	(5)
---------------------	-----

第三节 朝鲜文学	(10)
----------------	------

第四节 越南文学	(15)
----------------	------

第五节 蒙古文学	(21)
----------------	------

第六节 印度文学	(25)
----------------	------

第七节 阿拉伯文学	(30)
-----------------	------

第八节 日本文学	(34)
----------------	------

第九节 土耳其文学	(40)
-----------------	------

第十节 对于《大纲》的整体评价	(43)
-----------------------	------

第二章 从《大纲》到《讲义》	(45)
----------------------	------

第一节 在北京大学听课的收获	(45)
----------------------	------

第二节 穆木天和彭慧译文的作用	(48)
-----------------------	------

第三节 其他方面的参考资料	(54)
---------------------	------

第三章 关于《东方文学讲义》(上)	(60)
第一节 东方文学的地位	(66)
第二节 东方文学的特征	(73)
第三节 东方文学的意义	(76)
第四节 东方文学的分期	(82)
第五节 东方文学的分类	(88)
第六节 东方文学的古今比例	(95)
第四章 关于《东方文学讲义》(中)	(100)
第一节 东方文学的内容——印度文学(一)	(100)
第二节 东方文学的内容——印度文学(二)	(173)
第三节 东方文学的内容——阿拉伯文学	(219)
第五章 关于《东方文学讲义》(下)	(264)
第一节 东方文学的内容——伊朗文学	(264)
第二节 东方文学的内容——日本文学	(298)
第三节 东方文学的内容——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	(322)
第六章 结语	(353)
后记	(364)

第一章

关于《东方文学教学大纲》

不言而喻，一门课程的基本方向如何，是由教学大纲决定的。因此，要真正了解初创时期东方文学学科的基本方向，必须认真研究《东方文学教学大纲》的内容。

第一节 教学大纲的“说明”

1958年9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印刷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包括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东方文学（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简称这个部分为《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或《大纲》）。

首先，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份教学大纲总的指导思想。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由它前面的“说明”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个“说明”共有四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和第三点。

第一点是：

这份大纲要求以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学说为红线，根据师范大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民教师的目标，向学生介绍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文学和文学上的斗争。本着党的“厚今薄古”的方针和重视东方的指示，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和东方各国的现

代进步文学。^①

第三点是：

大纲是由教研组和苏联文学进修员、研究生以及中三、中四的同学共同编订的，越南留学生同学也以国际主义精神热情地参加了编写工作。大纲在九天内编出第一稿，又经过多次讨论，做了两次修订，成为现在的初稿。建立外国文学新体系的工作是一件新的任务，且大纲是由几个小组分头编写的，所以大纲的体例、繁简和水平都有不统一的地方，今后要结合教学不断地修改。

由于思想水平所限，资料缺乏，所以某些章节中关于两种文化的斗争，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还不够突出，整个大纲还是相当粗糙的，需要今后继续修订补充。特别是关于阿拉伯文学部分，结合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增订的必要。

我们恳切地希望同志们能多多地提出意见，补充不够的地方，批判错误的地方，使得外国文学的大纲成为一面坚定的红旗。^②

在这两点“说明”中，有几个需要特别加以阐述的问题：

一是“以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学说为红线”。这里所说的“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学说”，是指列宁1913年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其大意是说：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所谓

① 《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版，第1页。

② 同上。

“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要向一切民族的社会党人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① 列宁的这个理论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针对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民族文化”口号，而并非否定民族文化本身。至于如何以此为红线“向学生介绍世界文学史上的优秀文学和文学上的斗争”，《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并没有具体说明。但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全面地理解这个观点，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理解这个观点，从而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众所周知，所谓庸俗社会学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的观点体系。庸俗社会学者简单化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认为意识形态现象直接取决于物质现象和社会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文学研究中，他们抹杀文学的特殊性质，把文学的目的、内容同社会科学的目的、内容机械地等同起来，把文学变成对社会学的“形象图解”；他们认为文学的性质取决于作家的阶级出身，而不考虑政治、思想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作家的影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的性质是简单明了的，而不考虑文学作品在各种社会情况下多种多样的复杂表现；总之，他们喜欢简单地、机械地给作家和作品贴上阶级标签，划定阶级成分。从《大纲》的实际内容来考察，不难发现当时的编写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犯了类似的错误。其具体表现是，对东方文学进行简单的、机械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定性，重视现代文学，而轻视古典文学，重视无产阶级文学，而轻视非无产阶级文学，认为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才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而古典文学和非无产阶级文学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然而，东方文学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有些上层阶级出身的作家虽然基本上站在自己所属的阶级立场上，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却有可能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页。

接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人民大众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一定直接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但是这些作品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等等。既然实际情况如此复杂，那就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是“本着党的‘厚今薄古’的方针”。1958年3月10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学风相当盛行。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讨论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的表现。他强调学术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研究新时代的新问题。陈伯达的讲话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古”“今”问题的大讨论。有的主张“厚今薄古”，有的主张“厚今厚古”，有的主张“略古详今”，有的主张“博古通今”，有的主张“古今分家”，等等。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以“‘厚今薄古’论战胜‘厚古薄今’论”为题总结了这场讨论。文章认为：辩论中出现了十多种不同观点，但从实际上看只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两派；然后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于古代历史和古代作品的研究和教学，长期和古人为伍，加上立场观点不够正确，分析批判不够充分，很容易引导人们留恋过去，怀古鄙今，逃避当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迷失方向；“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斗争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此以后，“厚今薄古”便成为党的方针。对于这个方针，当时不少人简单地理解为古今分量和比例的问题，即在工作中少研究古代的，多研究现代的；在教材里少写古代的，多写现代的；在课堂上少讲古代的，多讲现代的。《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恰逢此时问世，自然会以“厚今薄古”为指导方针，并且由于不少编写者也持有类似的简单化的理解，所以在编写《大纲》

时便尽力压缩古代文学，尽力扩展现代文学。加之东方文学从来就没有写成过历史，尤其缺乏古代文学的材料，于是便形成了古代文学内容过少，现代文学内容过多，古今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

三是“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和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这里所谓“着重讲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应该既包括西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也包括东方现代无产阶级文学；所谓“东方各国的现代进步文学”，应该是指东方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进步文学。这种提法显然有片面之嫌，上文已经有所论述。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下问题：评价文学作品应当既注重思想性，也注重艺术性；既注重思想内容，也注重艺术形式；二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更何况所谓思想性和思想内容也不仅是指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和阶级属性，还包括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以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进步文学为原则之一，往往就会忽视其他许多不属于这个范畴的文学，往往就会忽视从古代到近代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往往就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发展的面貌，往往就会不适当地抬高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和进步文学的地位，而贬低其他文学的地位。另外，重视东方文学当然是正确的，但东方文学同样既包括古典文学，又包括现代文学；既包括无产阶级文学，又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既包括进步文学，又包括其他文学，不能片面强调其中一部分，而忽视另一部分。

四是“特别是关于阿拉伯文学部分，结合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有增订的必要”。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出阿拉伯文学，固然是由于这个部分内容不够充实，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正是阿拉伯各国掀起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时期，所以提出必须增加这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编写者思想观点的体现。

第二节 东方文学的“绪言”

其次，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份教学大纲中东方文学部分的指导思想。对于东方文学来说，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更加具体的，更加实际

的，更加重要的。那么，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由它前面的“绪言”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绪言”共有四点，以下分别予以论述。

第一点，原文如下：

东方是世界革命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基地。列宁论“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毛主席、周总理论亚洲革命力量的不可征服。东方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与遭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东方各国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深远影响。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高速度发展与空前繁荣。东方的古代文化是世界文化主要的发源地。东方各国社会主义文学与进步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批判以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代替世界文学、抹杀东方进步文学的资产阶级观点。^①

这一段讲的是东方文学的重要性。其中，指出“东方的古代文化是世界文化主要的发源地。东方各国社会主义文学与进步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等语是正确的，提出“批判以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代替世界文学、抹杀东方进步文学的资产阶级观点”等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其他的话语（如“东方是世界革命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基地。列宁论‘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毛主席、周总理论亚洲革命力量的不可征服。东方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与遭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东方各国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深远影响。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高速度发展与空前繁荣”等）都是从政治的角度论述问题的，不是从文学的角度论述问题的，这说明当时的编写者对东方文学的重要性还没有进一步的认识。

^① 《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第52页。